

试论 1925—1927 年苏共党内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之争

——权斗背景下的理论分歧

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在“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一看似简单的命题中,交织着因欧洲革命失败而使革命孤立落后一国的无奈和焦虑,苏共政治舞台上的派别重组和权力之争,以及或有一定深度的真正的理论分歧。文章以 1925—1927 年这一苏共舞台上权力重组和理论争鸣的关键时期为特定视域,揭示“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历史成因与理论分歧,从而引起对这一问题的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一国社会主义;托—季反对派;斯大林—布哈林联盟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2-0027-06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2.006

The Debate over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25—1927: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in Context of Power Struggle

LV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seems to be an easy proposition, but it reflects the anxiety because of the isolation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one backward country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 European Revolution, faction reorganization and power struggle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nd real theoretical differenc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action struggles and theoretical controversies between 1925 and 1927 in the Soviet history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causes and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in order to generate critical thinking about this issue.

Key Words: theory of “Socialism in One Country”; “Trotsky-Zinoviev” Faction; “Stalin-Buhalin” Alliance

“一国社会主义”论之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国际共运中的重大实践问题,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并且一经提出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运的走向。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命题并没有足够的反思,而这势必影响到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其他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其实,在这一看似简单的命题中,交织着因欧洲革命失败而使革命孤立落后一国的无奈和焦虑,苏共政治舞台上的派别重组和权力之争,以及或有一定深度的真正的理论分歧。1925—1927 年,是苏共舞台

上的政治派别发生分化重组从而帮助斯大林在 1927 年后实现其权力专断的关键时期,也是苏共党内爆发大规模理论论战的争鸣时期,“一国社会主义”论便是其中首要的中心议题。因此,本文以这一时期为基本视域,试对“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的历史成因与理论分歧略加揭示,以期促进对这一问题更加深刻全面的反思。

一、争论的基本概念和历史背景

在《列宁主义》一书的前面大半部分,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深揭猛批,而在后半

基金项目: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39)

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男,江苏无锡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部分对新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在一国的胜利等问题的论述中,则把批判的矛头隐隐地指向布哈林和斯大林,尽管其中仍然偶尔不伦不类地夹杂着某些对托洛茨基的批判。本书写于 1924 年末至 1925 年中,正是苏共舞台上权力与理论格局发生某种分化与重组的转捩点,即:为了排挤、打击托洛茨基(及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左翼反对派)而形成于 1922 年末或 1923 年初的“三驾马车”及其后发展而成的“五人小组”“七人小组”发生裂变,其中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成为“新反对派”,并在 1926 年中与托洛茨基派联合,共同对抗以斯大林、布哈林为核心的执政当局。本书中前半篇与后半篇之间批判矛头的这种转换,正可以看作这个转捩点的理论反映。就季诺维也夫个人来讲,导致这种转换的原因与前面的“非托”运动一样,也是交织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与真正的理论分歧,但与前面的“非托”运动不同的是,“非托”运动中权力斗争占着较大的比重,而这次则理论分歧占着较大的比重。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讲,虽然“三驾马车”成功地排挤、打击了托洛茨基,但季诺维也夫作为“三驾马车”中的论战主力在与托洛茨基的骂战中双方都元气大伤,某种程度上反使斯大林坐收渔利,也就是说在使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威望有所下降的同时却使原本声望平平的斯大林开始浮出表面;再加上斯大林在总书记职位上操控纪律的职务之便和善于弄权,使得斯大林已经取代季诺维也夫成为“三驾马车”乃至“五人小组”“七人小组”的“车老大”。权力座次的这种变化,季诺维也夫在与斯大林的深度合作中才深谙的斯大林的权谋和狡诈,以及一旦得势之后为季诺维也夫自叹弗如的官僚和专断,无疑增加了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的嫌隙。但更主要的还在于理论上的分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不具有与现实无关的纯粹性,理论本身变相而曲折地反映了现实中的权力格局和物质利益。

“一国社会主义”问题是 1925—1927 年理论斗争中的核心问题,它缘起于 1924 年初斯大林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并在 1925 年与布哈林一起作出理论论证。由于这个概念容易引起误解,因此需略作界定。“一国社会主义”不是指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而是指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解中的,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的社会主

义,国家消亡,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特征,而不是现在所说的各种更加初级的社会主义。这里的“一国”也不是指任意一国,而是指像苏联那样具有各种优势的“一国”。但这个理论一旦形成之后,它自身的逻辑发展就超越了最初对它的这种界定,变成对任何国家都“普适”的理论。因此,当时斯大林、布哈林的观点就是,不需要世界革命的背景,哪怕只有苏联一个国家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它也能建成社会主义——按此逻辑,当然也能建成共产主义。而作为这个理论对立面的托一季反对派则认为必须有世界革命——特别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欧洲革命的支援背景下,苏联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根据托洛茨基关于革命不平衡发展之限度的理论,苏联虽比其他国家早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但由于其各方面的落后性,因此要比迟发生革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建成社会主义。这样就形成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确切地说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与世界革命论的对立。

二、分歧成因与派别重组

当时所有的争论都是在列宁主义名义下进行的,争论各方都需要证明自己的观点符合列宁主义正统,“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也不例外,更由于斯大林后来的理论垄断,“一国社会主义”论就真被理解为列宁的独创发明了。其实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很清楚的,如果不是故意地曲解混淆,就不会从列宁那里得出“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观点。斯大林和布哈林主要对列宁偶有的一两段引起歧义的话大做文章,而完全抹煞了列宁关于苏联有赖于欧洲革命的众多论述。关于列宁的这些原话,以及如何正确地理解列宁引起歧义的那一两段话,季诺维也夫在《列宁主义》中,特别是托洛茨基在后来更多的著作中作了详尽的摘录和论述,且笔者在其他论文中也曾就此做过论述,因此这里不再重复。

当 1924—1925 年斯大林、布哈林提出这一理论时,季诺维也夫是反对的先锋,当时他与斯大林、布哈林共同反对托洛茨基的阵营尚未破裂,大概是对列宁主义的这种重大修正超出了季诺维也夫的理论底线,使他不能因派别问题而苟同,何况派别内部已有不睦。因此以这一问题为契机形成了 1925 年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区别于 1923 年以托洛茨基为核心的左派反对派。而托洛

茨基当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加入这一争论,这显然不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此没有明确的观点,或者说还需要通过某种观望以确定自己在权力斗争中的“站队”问题,而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他对此没有兴趣,在经历了1923—1924年官僚机器完全出于权力斗争而对他和反对派的打压之后,他此时正处于一种比较消极无为的状态。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正是这段时间托洛茨基错失了許多扳倒斯大林的有利时机,以至于当他决心开始斗争的时候,发现已经力不从心。他大概觉得“一国社会主义”这种问题根本不是值得争论的理论问题,它低于批判的水平。但他后来会看到,正是这个在理论上不值得争论的问题,却对现实政治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巨大影响,于是这个低于批判水平的理论成了他终生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前一个阶段季诺维也夫对他的无情攻击所导致的嫌隙,也使他宁可对任何一派都处于观望状态,而不去认真地看待和加入他们的争论。因此,尽管从1925年起托洛茨基与季诺维也夫在理论上已形成愈来愈多的共识,包括与“一国社会主义”问题相关的对新经济政策的理解问题,但直到1926年中两派才真正联合,形成托—季联合反对派,对抗实际执政的斯大林—布哈林联盟。

我们再来看看斯大林、布哈林这边,他们为什么从1924年秋起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为了打倒托洛茨基完全不需要这个理论,因为通过批判“不断革命论”以及所谓的托洛茨基与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等等已经足够了,况且此时托洛茨基已经被边缘化。若说他们从来相信这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则更是无稽之谈。因为不仅在1924年秋之前苏共党内从来无人公开正面阐述这一理论,而且就连斯大林本人在1924年初还说与此相反的话。至于布哈林则一度还是党内的极左派,当1921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对于德国革命提出“走向群众”的口号,也就是说因条件不成熟而暂缓武装起义时,遭到布哈林和整个共产国际极左翼的疯狂抵制,后者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的稳定,无产阶级必须不停息地进攻,也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孤立的苏维埃俄国。这使得列宁和托洛茨基反过来压制这股极左思潮,反复劝告他们:“不要太急于拯救我们,那样做,你们将只能毁掉你们自己,当然也将使我们遭

到毁灭。要有步骤地采取为群众进行斗争,以便进一步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我们需要你们的胜利,但不需要你们在不利的条件下准备进行战斗。我们将设法在新经济政策的帮助下,使我们自己在苏维埃共和国内继续存在下去。我们将继续前进。如若你们聚集你们的力量和利用有利的形势,你们仍然有时间在适当的时机帮助我们。”^{[1]75}那么他们为什么在1924年秋即列宁去世后不久就开始炮制这个理论?说他们随着时移世易而发生了某种理论认识上的变化,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对布哈林来说,恐怕还是有一定的理论真诚的。但这显然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也不是发生在书斋里的事情,而是与当时的现实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再者,就算这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真实理论转变,而非弄权之术,这个理论与列宁也并无关系。根据笔者的理解,这个理论的提出基于两种现实背景。

第一,官僚主义的保守性或者如曼德尔所说的“部分成果辩证法”,即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果(如在一国夺取政权)之后以保住既定成果为目标,而背叛了原来的目标(如共产主义的世界性事业)。对于苏联的既得利益者即执政官僚来说,保住一国的既有政权,尽量避免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正面冲突,当然比推动世界革命安全得多、有利得多。须知世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可能招致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反扑,而且包括苏联无产阶级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也会动摇苏联官僚的既定统治秩序。因此,“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是符合官僚特权集团的现实物质利益的。这一点原因主要适用于斯大林派,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斯大林这个人物从各方面都适于充当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言人,所以他在与各派的斗争中总能获胜,在他获胜的背后是整个官僚集团的“坐大”和世界革命的总体性衰退。革命的这种衰退还表现在苏联的多数群众在多年的战乱之后也希望有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因此他们虽经受过十月革命的洗礼并对托洛茨基抱有巨大敬意,但在本能上却对主张继续革命的“不断革命论”反应漠然,而更倾向于在表面上比较温和的“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也是托洛茨基以及后来的联合反对派不能有效地发动群众,而“一国社会主义”论却日益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和群众基础。

第二,对欧洲革命的殷殷期待落空之后,特别是

1923 年的德国革命失败之后,不得不摒弃对世界革命的期待,于是提出“一国社会主义”论。这一点大概对布哈林比较适用。据说布哈林对欧洲革命的寄望最切最极端(否则怎能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成为反对列宁的极左派呢?),因而一当发现这种寄望落空之后就发生了一种急剧的摇摆,索性放弃了对世界革命的依托,这一点大概与布哈林极端的、要求彻底性的思维方式有关。有种说法叫做人总是善于美化自己的处境,“把自己的因缘当成自己的英明”,布哈林之提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大概就带有这种心理色彩。但理性地说,在外界环境的逼迫下不得不在一国之内建设社会主义,终究不等于在客观上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

三、理论分歧之一:世界经济视域中“一国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

由于争论各方都要表明自己与列宁观点的一致性,而列宁毕竟说过许多关于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取得最终胜利的话,因此斯大林、布哈林在提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时又必须要玩一些文字游戏,以掩盖与列宁的冲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能够在苏联一国建成,但这却仍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的,结论只能是这样,这样就在表面上规避了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与一国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何以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但这种胜利又不是最终的胜利呢?

据布哈林和斯大林说,虽然苏联有凭一国之力建成社会主义的能力和条件,但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中不能完全地免于外部的武装干涉和军事颠覆,因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没有最终的保障。根据这种理论,苏联所应致力的方向就完全变了,特别是对欧洲发达国家,不仅不应推进它们的革命化,反而应当避免与它们的正面冲突,免得引来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以便能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静静地建设社会主义,哪怕是以乌龟爬行的速度。这种理论看起来很诱人,但并不因此而得以成立。托一季反对派与斯大林、布哈林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对立可归结为:在没有外部的武装干涉的条件下,苏联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前者反对这一点。托洛茨基认为,在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预设社会主义苏联可以孤立于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之

外,然而这一点正是不能成立的。

托洛茨基指出,十月革命本是世界性的经济、政治矛盾激荡下的产物,“如果没有两个国际条件,即第一,如果没有大大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本;第二,如果没有推动我国无产阶级斗争的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世界上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我国革命。在 1917 年以前,革命就是通过各种伟大的世界力量的汇合而准备起来的,十月革命就是由于这些力量的汇合并经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2]228}。那么,在革命胜利之后,又怎能把视野局限在一国之内,认为似乎社会主义的事业可以仅仅是苏联一国的事情?托洛茨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力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一点更以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结果不仅带来了对外贸易、人力和资本的输出现,强占领土、殖民政策和上次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使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工作在经济上成为不可能的事”^{[1]46}。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性的经济政治联系之外,在一国之内独善其身,更何况这种社会主义事业本是世界性矛盾的产物。针对布哈林所说的如果没有武装干涉,苏联就能撇开国际事务,单独建成社会主义的说法,托洛茨基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上的发言中幽默地反驳说:“但撇开是**办不到的!**全部关键就在于此。(笑声。)如果‘撇开’天气和民警,可以在正月间裸体走在莫斯科街头。(笑声。)但是我担心,如果你们要这样做,无论天气或是民警都不会撇开你们的。(笑声。)”^{[2]227}(引文中标注的加粗字体若无特别说明皆为原文所有——下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无时无刻不处在相互联系之中,“问题在于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经济关系。这种相互关系决不限于所谓武装干涉这种特殊形式”^{[2]227},相反地,武装干涉只是经济联系的外在和延伸表现。

布哈林不知道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这种经济联系吗?不会的,他还是放松对外贸易垄断的主张者,也就是说他还要求增强、放开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那他为什么还要大谈撇开国际事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在列宁晚年反对放松甚或取消对外贸易垄断的斗争中,托洛茨基倒是唯一支持列宁的人,正因为深谙富国经济的无形冲击不亚

于武装干涉,所以坚决主张以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来作为阻挡的武器。但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强调:“认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绝对的保证也是不正确的。其有效程度取决于我国经济劳动生产率同世界经济劳动生产率靠近的速度。”(托洛茨基《经济问题笔记》)从这里又引出了对布哈林另一个错误的批评,即所谓以乌龟爬行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布哈林这个观点实际上正是建立在“撇开国际事务”的前提之下,既然能够“撇开”,苏联以什么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就完全是自己的事了。但在实际上不能撇开的情况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就直接决定了苏联受富国经济冲击的程度,而苏联经济建设的速度反过来“最直接最尖锐地取决于原料和装备的进口”^{[2]228}。因此,即便撇开武装干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进展也直接、深刻地取决于它的国际环境,独善其身的一国社会主义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社会主义不存在于真空中。后来布哈林这个以龟行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说法沦为笑柄,即便“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支持者也没人会撇开国际事务以龟行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了。“一国社会主义”论在其发展演变中实际上发生了另外的修正,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个理论一经提出就不再受制于最初的界定。

四、理论分歧之二:“莫须有”的农民问题

布哈林、斯大林对“一国社会主义”论还有另外一些论证,但也同样不靠谱,如果不是更不靠谱的话。例如,布哈林指出,托洛茨基之所以认为“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我国的无产阶级“会同农民发生冲突”。于是,布哈林进而驳斥道:据此推论,只要世界上还有大量农民存在,即便无产阶级在世界上取得政权,也还是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会同农民发生冲突^[3]。但事实上,根据我们上面的论述也可看出,托洛茨基之所以认为“我国没有西欧无产阶级的国家援助就无法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并非因为无产阶级“会同农民发生冲突”。

托洛茨基的确说过无产阶级会与曾经协助其夺取政权的农民发生冲突的话——从理论上来说并没有错,这种说法不仅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是列宁的观点,甚至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列宁虽认为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得到了贫中农甚至全

体农民的支持(列宁在这一点上在不同地方的表述略有差异),但也认为随着民主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将与农民发生冲突,他也确实在十月革命后强调镇压富农以及警惕中农与工人国家的对抗。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提出后,这一点才有所改变,而之所以改变,并非因为上述理论原则上不正确,而是因为苏俄的特殊情况(孤立一国、经济落后、农民多数)导致尚不能直接进行理论上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观点在农民问题上的表现就是缓和与农民的冲突,与农民达成妥协。而托洛茨基既然赞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也是赞同与农民的这种关系的。但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农村的经济和阶级分化日益突出,这就使托洛茨基更加强调对富农的遏制这一方面。但这也并非意味着与农民发生冲突。托洛茨基的设想是通过从政治上遏制富农的崛起,加强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使绝大多数农民摆脱富农影响,并在经济上通过剥夺富农,发展工业化,以工业化的成果反哺贫中农。所以托洛茨基即便主张遏制和镇压富农,也还是要维护工农联盟的,并且正是为了巩固工农联盟,才防止农民在富农影响下与工人政府对立。这样说是要表明,布哈林对托洛茨基的农民观本身是误解的,托洛茨基也是要通过新经济政策建立与农民的合作、妥协关系的。

就算退一步,承认在新经济政策下,列、托之间在农民问题上的观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妥协合作,后者强调对立冲突,那也只是涉及在苏联这样的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如何妥善处理工农关系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妥善处理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在一国之内也还是不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哪怕在农民人口占少数的发达国家发生革命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冲突也几乎不存在,但基于上述的经济原因,仍然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列宁曾指出,苏联这个农民人口占多数的落后国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成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一是正确地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二是及时地得到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的援助。布哈林在这里混淆了这两个问题,似乎托洛茨基反对“一国社会主义”论仅仅是因为他错误的农民论。其实托洛茨基的农民论本身是遭到误解或歪曲的,而布哈林在此却将这个本身被误解的农民论误解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原因,因此布哈林对托洛茨基的这段驳

斥是建立在双重误解之上的。

五、理论分歧之三：斯大林蹩脚的补充性论证

如果说布哈林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论证多少还带有一定的迷惑性，那么斯大林的论证就显得更为不值一驳。斯大林是这样来论证之所以在马恩原初的理论中社会主义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建成，而到了现在社会主义则可以在一国建成的：“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会怎样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4]561} 斯大林的意思是说：在资产阶级社会走上坡路的时候不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只能在全世界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什么逻辑呢？资产阶级社会如果还在走上坡路，恰恰不可能在全世界建成社会主义，更别提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了。斯大林接着说：资产阶级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主义便可以在一国建成了。这又是什么逻辑呢？如果资产阶级在整体上即世界范围内开始走下坡路，那么意味着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成为可能。但这个过程仍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事，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到一国范围。由于资产阶级社会走下坡路的过程在各国是不均衡的，因此有可能在落后国家打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缺口并取得胜利，但恰恰因为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潜力尚未释放殆尽，而比其他国家更远离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更不可能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何况由于上述世界经济相互联系的原因，即使富裕一国也不能单独建成社会主义呢？

又如，斯大林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与“一国社会主义”论挂起钩来，他认为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帝国主义时期的独特规律，因此帝国主义时期与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由这种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得出可以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而反对派则认为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规律，不是帝国主义时期所特有，甚至在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因此从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得出“一国社会主义”论是无稽之谈。应当说，反对派认为不平衡规律是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是正确的，斯大林

强调帝国主义时期的不平衡规律有其特殊性这一点也有合理之处，但从中得出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不成立的。如斯大林所说：“帝国主义时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就是：一些国家通过跳跃式的发展超过另一些国家，一些国家很快地被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以军事冲突和战争灾祸的方式周期性地重新瓜分**已被瓜分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冲突加深和加剧起来，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削弱，个别国家的无产阶级可能突破这条战线，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国家内获得胜利。”^{[4]576} 斯大林的这个论述应当说是基本正确的，但这是落后一国发生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依据，而不是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依据。斯大林在这里仍然借“胜利”这个模棱两可的词汇混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胜利和建成社会主义的胜利。

此外，斯大林和布哈林认为反对派否认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就是否认十月革命的合理性，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等等。这些都建立在对列宁主义和反对派本身的理论的有意歪曲之上，不足深论。如果说斯大林本身是一个使他的理论服务于他的权力需要因而是没有理论原则的人，那么布哈林对“一国社会主义”论的提出和论证则是他理论生涯中的一大败笔，正如他在 1924—1927 年帮助斯大林打击反对派是他人格上的一大败笔一样——而这两者实际上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布哈林此时对反对派的抨击早已逾越了理论争论的范围，而是在官僚机器掩护下丧失了基本的理论真诚和正直人格，以至于博得斯大林的夸奖说：“他不是在同他们争论，而是在宰他们！”（转引自伊萨克·多伊彻《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托洛茨基：1921—1929》，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版，第 333 页）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理论或目的本身是正义的，卑劣的手段也势必将它们导向不义的方向。这是布哈林的悲剧，当然又绝不仅仅是布哈林的悲剧。

参考文献：

- [1] 托洛茨基. 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M]. 吴继淦, 李澍,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 1965.
- [2] 郑异凡. 托洛茨基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 [3] 布哈林文选: 中册[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173.
- [4] 斯大林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责任编辑: 白丽娟)